

武工队三进淮宝

□ 姜海舟 姜瑞荣

淮宝县是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为打通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的通道，将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命令，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所部向洪泽湖东岸三河以北地区进军，在这块原属淮阴、淮安、宝应、盱眙、泗阳等县之间的边缘地带建立淮宝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经上级批准成立抗日民主政权——淮宝县政府。

抗战胜利后，获得解放的淮宝人民，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可是，1946年6月，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悍然挑起内战。我主力部队进行自卫反击，在苏中、淮北等地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英勇的淮宝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坚持原地，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历经“三出三进”的艰苦游击斗争，最终配合大军正面反攻，恢复了淮宝根据地。

一进淮宝

1946年10月4日夜，中共淮宝县党政机关及区乡武装400多人北撤。10月17日，中共华中第五地委书记曹荻秋在盐城阜宁板湖镇主持召开淮宝县委（扩大）会议，区委书记以上党员干部全部参加。大家一致认为，坚持淮宝斗争，对支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战斗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从全局还是局部着眼，都应该坚持斗争。会议重新调整了县委领导班子，由李绍武任县委书记，邵伟光、万立誉任副书记兼淮宝县县长，并制定了打回淮宝的方案。

22日夜，由淮宝北撤干部组成的县武工队400多人，从益林出发，经20多公里的行军，到达运河边上的黄浦，悄悄渡过运河后，踏上了淮宝土地。天亮时，武工队到达白马湖边的小堆头，在准备渡过白马湖时，被国民党军发现。淮宝武工队立即占领小堆头以西的东闸口，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抵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随后，淮宝武工队按照原定计划兵分三路：第一路由万立誉、徐明率领吕良、东湖，南宁县的武工队，向草泽河以南、三河以北地区进军；第二路由邵伟光、魏其虎率领盐北、盐南、黄集，林集、陈集、顺河区的武工队，向得河以北地区挺进；第三路由李绍武、吴锡昌率领岔河、越城、盱宝区的武工队，向草泽河以北、得河以南以及山阳河以西地区进军。



1948年，曹荻秋（前排右一）和战友们合影

万立誉、徐明所率领的武工队进入吕良区顺河乡的一个水上村庄，经过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乡自卫队，击毙了敌乡长。与此同时，李绍武、吴锡昌带领的武工队也向敌人还乡团开展了斗争。在岔河附近的三朱庄，李绍武等遭到6个乡国民党自卫队的包围，激战一天后，突围进至东湖柴滩。考虑到无法得到粮食、弹药补充，第一路、第三路武工队暂时撤出淮宝，第二路留在得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二进淮宝

从淮宝撤出的武工队，在宝应大官庄一带会合后撤往阜宁。两天后，地委决定派出一个加强连护送武工队再进淮宝，“打下一个局面”。

1946年11月4日，淮宝武工队第二次进入淮宝。从新河头渡过白马湖，在马子扬一带的村庄驻扎，仍在得河以北地区坚持的邵伟光、魏其虎所率领的武工队闻讯也前来会合。

7日凌晨2时，加强连和武工队兵分四路攻打岔河镇，由于兵力不足，致使部分敌人逃脱，未能达到全歼的目的。岔河镇战斗结束后，武工队返回马子扬，加强连返回阜宁复命。

岔河镇一战，使国民党自卫队反动气焰大为收敛，不敢主动与武工队纠缠。李绍武、万立誉率领武工队在盐南、岔河一带活动；魏其虎带领黄集、顺河等区武工队在岔河西部活动；黄旭明带领盐北武工队在盐河两岸活动，不断出击国民党自卫队、保安队、还乡团，摧毁国民党乡村反动政权，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当地的国民党政权非常惊恐，急忙召集国民党正规军前来“清剿”。淮宝武工队将情况及时报告给地委，请求支援。

为了接应五地委派来的支援部队进入淮宝，徐明、张鹏兴率部回到林集区做准备，负责部队进驻新河头的安全，并供应一部分粮食。11月20日，徐明、张鹏兴率部深入南码头一带，辗转战斗两天两夜，扫除还乡团武装，缴获一批粮食。23日下午，他们又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去新河头侦察敌情，途中与一个连的敌人遭遇。徐明、张鹏兴等6人沉着应战，掩护战友转移，终因寡不敌众，6人壮烈牺牲。

不久，地委派一个加强连来到淮宝马子扬支援武工队。当天，武工队和加强连在西闸口阻击敌人的进犯，经过一天战斗，打退了敌人。第二天，敌人集结优势兵力再攻马子扬，由于缺乏起码的救护条件，一些负伤的同志得不到及时抢救而牺牲。月底，为了把负伤的同志送到后方治疗，县委领导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暂时撤往运河以东。

三进淮宝

曹荻秋听取汇报后，鉴于淮宝的战略地位重要，决定坚持淮宝的方针不变，并决定加强淮宝的军事力量——由华野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杨效椿率一个营（220余人），第十二纵队第八二团副团长王朝发带一个加强连，与淮宝县武装总队共同收复淮宝；在打开淮宝局面后，再转向淮南活动；同时，成立淮宝军政委员会作为临时统一领导机构，由杨效椿任主任，李绍武、万立誉、王民任委员。

1947年1月15日，淮宝武工队会同华野部队第三次进入淮宝。敌人为了阻挡游击队渡运河，把大小船只全部集中在运河西岸，武工队为了按时完成接应任务，不顾三九严寒脱去衣服，跳进冰河，游到对岸后拖回船只，保障了大部队顺利

渡过运河。在穿过运河封锁线后，部队被山阳沟据点的国民党军发现，双方展开战斗。杨效椿率部队且战且走，将敌人引至小堆头，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武工队向敌人猛烈射击，将敌击溃。此后，部队按照事先部署，分头向各自目标挺进。

负责浔南地区收复斗争的杨效椿、万立誉部于16日乘船南下，击溃沿途国民党自卫队的堵截，于18日夜突袭吕良镇，一举歼灭了敌自卫队，摧毁了镇公所，并将缴获的粮食、物资分给贫苦农民。战后，杨效椿、万立誉率部队与武工队越过老三河南进，沿途敌人吓得望风而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部队派出干部战士深入邻近的村镇进行宣传，并对自卫团成员家属进行政治攻势，让他们规劝自卫队员改恶从善，争取宽大处理。由于万立誉、田垒、马杰在淮宝地区群众中很有威望，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自卫队对他们又恨又怕，于是造谣说“三人已被打死”。因此进军途中，三人有意拉开部队距离，频频和沿途群众亲切交谈，让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

军政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将下一步的行动目标设定为驻仁和镇的宝应县三区区公所。由于仁和镇易守难攻，杨效椿、万立誉决定实施“引蛇出洞”战术。1月24日，三名侦察员化装前往仁和镇，在故意暴露身份后“逃走”。镇内敌人立即倾巢而出，穷追不舍。当敌人追到仁和镇西乡三里外的纪家庙时，被杨效椿率部包围、歼灭。与此同时，埋伏在镇外的万立誉率部突入仁和镇，一举消灭了敌区公所。此次战斗后，周边18个乡镇的敌人公所纷纷瓦解。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杨效椿、万立誉又率部西进到严渡、双沟乡，消灭了敌自卫队。至此，国民党宝应县三区特别是草泽河以南地区的根据地基本上被收复。

与此同时，李绍武、王民也率部在浔北展开了收复根据地的战斗，打掉了多个地主武装的据点，肃清了敌还乡团、自卫队。不久，各区武工队先后返回原地活动，重建民主政权，开展各项工作。到1月底，淮宝的19个集镇均被收复，得河以南一带地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三进淮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摘自2022年7月12日《人民政协报》）



1930年，为加强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党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长江、北方和南方3条秘密交通线。其中，由中共中央机关驻地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到中央苏区瑞金的南方交通线，是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最为隐秘的一条。它见证了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文件、情报资料，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安全掩护领导干部和优秀人才转移到中央苏区等任务的顺利执行，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肩负特殊神圣使命，有效确保苏区联络畅通。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能否保证信息畅通又保守军事秘密，不仅事关战争胜利，而且攸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应运而生。该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突破敌人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盘查和暗探追踪，避开反动民团袭击，出色完成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任务。

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线实行一整套保密方式。首先，交通站点多选择在店铺、茶馆、学校和一些娱乐场所，可以更好地迷惑敌人、完成掩护任务。其次，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交通员一般只能单线联系，并不了解全线情况。执行任务时，交通员常用画家、探亲者或商人等身份作掩护。为避免随身携带的情报和物资被搜查，交通员想尽了办法。他们使用密写药水将文件情报写在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裤带、纸伞杆、柴火、装运书籍的竹篓，甚至手里的甜瓜瓢，都是其藏秘之处。每一次护送任务都危机四伏，需要交通员快速应变，与敌人斗智斗勇。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建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保证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之间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打通物资运送“大动脉”，确保苏区稳定运转。在国民党“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经济封锁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食盐、药品、布匹、电器和军用器械等物资十分短缺。交通线上的各个交通站就成为红军物资的重要来源。汕头交通站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利用开电器材料行之便，争取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暗地里将各类物资一箱箱地运往苏区。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后，往往先被隐藏在偏僻之地。待交通站的同志做好记号后，再通知苏区派出武装力量抢运。有时，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通过这条交通线，苏区还住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提供了大量的工作经费。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直抵福建漳州，取得漳州大捷，这一仗共缴获2000余支枪、6门炮、13万余发子弹、4900余枚炮弹、2架飞机，还筹集到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另外还有上百万银圆。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安排部署下，地下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化装成外出务工的农民，将价值5000元的

隐秘而伟大的红色交通线

□ 程宇一 李佳颖

黄金藏在道具里，机智沉着地躲过土匪、警察的盘查，历尽艰辛将黄金安全地交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交通员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冲破重重关卡，安全运送大量重要物资，确保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的正常运转，为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作出重大贡献。

持续输血补充骨干队伍，加强苏区领导力量。中央苏区创建后，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为满足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央十分重视并多次向苏区输送优秀干部，规模较大的就有3次，即1931年前后、1931年4月后和1933年初。第一次是由于我党我军在南方各省开辟多块革命根据地，迫切需要人才队伍力量补充。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其中包括中央和各地方的政治、军事领导干部，以及曾在苏联留学的党员和旅欧学生，包括叶剑英、张爱萍、左权、萧劲光等。第二次是由于国民党大肆搜捕清剿，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大批干部被及时转移至中央苏区。另外，共产国际也指示要派60%原本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到苏区去，因此很多优秀干部陆续转移至苏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刘少奇、邓小平等。第三次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党中央处于危险境地。中央苏区刚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安全，正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因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次经“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张闻天、陈云、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此外，兵工厂、制弹厂、造布厂、印刷厂的多批技术工人及大批电讯技术人员和文艺工作者，都通过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并在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宣传发动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摘自2022年9月15日《中国国防报》）

一张名片背后的故事

□ 潘洁

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围绕中共中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一中心任务，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营救了一批被俘和失散的路西军人员；热情接待过往人员，及时转送抗战物资，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带领全体人员利用各种机会，对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在当地出版的报刊上，他们针对抗战形势及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发表了大量中时弊的文章，对于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揭露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丑恶嘴脸，起了很大作用。

据统计，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先后选送了5批300余人赴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习。杨静仁、乔映淮、王欧村等一大批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了去延安的道路。王欧村是抗日名将、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的秘书。他思想进步，深受将军的器重与信任，被任命为第30师军需处少校主任。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在抄家时发现了王欧村为将军起草的文稿，他随即被列入通缉黑名单。此后，王欧村辗转来到张家口，积极参加救护伤员等工作，后因病回家调养。养病期间，他仍投身抗日工作，想尽一切办法联络各方的抗日部队。

之后，王欧村来到兰州，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取得联系。谢觉哉亲笔写了介绍他赴延安的名片。王欧村持此名片赶赴西安找林伯渠。时逢林伯渠外出，一时未能联络上。此时，王欧村病情急剧恶化，遂返回家乡养病，于1943年11月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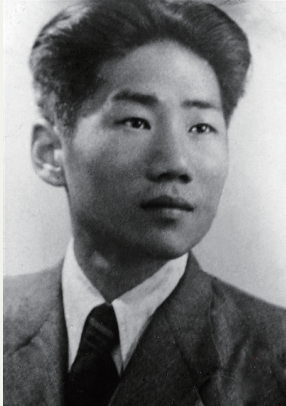
如今，这张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和追求的名片，陈列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展厅里，接受着游人的注目与敬仰。它静静地诉说着：在那个向往光明、向往革命的年代，进步青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引导下，为了民族解放和家国振兴迈向心中的革命圣地……

（摘自2022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



『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 申智林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矗立在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192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幼年随父母辗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1930年10月，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营救救出，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上海。1931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毛岸英流浪街头，在烧饼铺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历尽艰辛。

1936年，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毛岸英去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

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6年，毛岸英来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不论是解放战争时期，跟着中央土改工作团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厂任党委副书记，毛岸英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

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国空军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摘自202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毛岸英：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